

原道

第十七辑

主编
陈明
朱汉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原 道

第十七辑

陈明 朱汉民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道. 第 17 辑/陈明, 朱汉民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56-0641-0

I. ①原… II. ①陈… ②朱… III. ①文史哲—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9579 号

YUAN DAO

原道(第十七辑)

陈 明 朱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 佟 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7 千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编委会

主 编	陈 明	朱汉民		
顾 问	李泽厚	庞 朴	韦政通	杜维明
	余敦康	李学勤	牟钟鉴	陈 来
学术委员	郭齐勇	李明辉	蒋 庆	赵汀阳
	盛 洪	廖明春	郑家栋	林安梧
	任剑涛	邓小军	黄玉顺	卢国龙
	张新民	东方朔	韩 星	刘乐贤
	温 厉	于述胜	高全喜	杨立范
	朱汉民	干春松	彭永捷	陈 明
编辑成员	王 正	张宏斌		

本 辑 作 者

- 陈端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陈 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翁贺凯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姚中秋 独立学者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琨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高翠莲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曾 亦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冯建章 三亚学院讲师
张旭东 纽约大学教授
李 灵 旅美学者
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
王 伟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姚新勇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 涛 复旦大学副教授
高默波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
邸永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杨丹荷 旅美学人
郭昱辰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
蒋 庆 阳明精舍山长
张新民 贵州大学教授
田中有纪 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目 录

中华民族专题	
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纪要	(3)
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	
——在“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许章润 (67)
中国民族主义的断想	王 锐 (78)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	高翠莲 (89)
内外与夷夏	
——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曾 亦 (100)
变化中的国家认同	
——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	姚大力 (126)
“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	
——以如何吸收传统的神性资源为论说中心	冯建章 (149)
试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	
——写在国庆 60 周年前夕	张旭东 (161)
“文化重建”之管见	李 灵 (171)
民族与国家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王铭铭 (181)
萨满式文明与中国文化	
——以中国东北部索伦鄂温克族为例	王 伟 (199)
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思潮”观察	姚新勇 (213)
民主化与种族清洗：读迈克·曼《民主的阴暗之面》	王 涛 (244)
从对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高默波 (249)
基督信仰、佛教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	邱永君 (261)

道德、理性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

——析论熊十力“体用不二”“超越在己”的认识立场

..... 杨丹荷 (267)

“冯友兰版本”援西入中得失小议 郭昱辰 (280)

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

——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

..... 张新民 蒋 庆 (291)

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

——陈祥道与陈旸的雅乐构想 田中有纪 (310)

编后记 (327)

中华民族专题

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纪要

时间：2009年10月5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

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

参加人员：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翁贺凯 清华大学；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任毅 国家民委政研室；葛中华 全国人大民委；陈端洪 北京大学；强世功 北京大学；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 自由撰稿人；田飞龙 北京大学。

第一部分

陈明：介绍一下，我们从最右边开始。翁贺凯，清华大学的，治中国政治学，属于新锐；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任剑涛，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姚中秋，独立学者、翻译家、评论家；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张海洋，这次会议最对口的，民族大学的，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敢说直话的人。我多说两句，本来我是找马戎的，但是马戎时间冲突。一个朋友说，要是把马戎和张海洋弄到一起开会那就好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之间思想上有一点点火花？

张海洋：陈明兄怕是引喻失类了。马戎老师是海洋师长辈。他本人是少数民族学者，所以多从国家层面着想和说话。海洋是汉人学者，所以多从少数民族角度着想多些。这里既

有跨年代的互补，也有跨民族互惠交流之意。

陈明：得罪得罪！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对他们只是有点了解。他们的爱国心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追溯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一种差异？我们一会儿可以听海洋怎么讲的。

任剑涛：讨论会正式开始。因为西藏事件和新疆事件催促我们思考相关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来讲，民族问题已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经典的斯大林主义形态，还是改革的社会主义形态，多民族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难题。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近现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范围讨论，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一般不好说，因为一说就把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所以刚才陈明一说，我们谈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就觉得有点紧张，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太沉重，谈得轻松一点。实际上，我先让强世功发言比较好的，因为他做过政府官员，民间体验和官方体验差异很大。但是我们在座的法学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需要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上先补课，所以我们首先请张海洋教授给我们先补20分钟，现在开始。

张海洋：谢谢陈明兄和各位。学术研讨会应该按学问来排发言顺序，外行人应在后。主席今天按年齿即离八宝山的距离排序，海洋应在前。剑涛兄看出民族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海洋同感。事实上，中国无论做不做现代化，崛起不崛起，都要安顿好两个国本：一是农民；二是少数民族。农民的事儿主要是经济或阶级的事儿，现在国家在三十年里通过中央的三次重大决议和十多个1号文件，已经安顿妥帖。只要地方政府跟房地产公司不去招惹，农民跟国家很和谐一阵儿了，虽然整个社会还是要考虑如果没有了农村文化，中国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民族问题就很不一样，它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认同问题。认同从哪里来？应该是从国家和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安顿中来。什么叫安顿？就是对大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个说法儿，让一种团结合作关系长久持续，而不是走到半路就要由谁把谁做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经济问题来看，那是私衷浅见。说到底，这是个文化即道德问题。首师大也是中国文化研究重镇，我不能亲聆孙长江前辈的教诲但心向往之。今天陈明兄让说“中

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形态”。海洋愿意从抠字眼开始。什么是中华民族意识？宪法定义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那意思是中国人对外统一称中华民族，对内还是要承认多民族及其文化，既然承认这个现实，就要尊重它，还要从法律上做好相互尊重的框架或形态来。中国终究要做现代国家，因而我们要根据国情来做现代国家形态。但现代了的中国还会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会改变，我们因此要按照这个前提来完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规则和形态。这问题请各位思考。

陈明兄还说了学科。我认为学科都是培训人的路径。真到了做研究时，就应该是问题导向。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学科就都是通向罗马的道路，但不是罗马本身。很多人走到半道就说自己站的这个地方就是罗马，那就不是要建设学科而是想成佛做祖了。民族学人类学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和族性。理解人性的就是人类学，理解族性的就是民族学，但人性跟族性也很难区分。人性除了自然的饮食男女，大概就是文化上的分层分类了。这都是人之大欲，都要好好安顿。国家面对这些人之大欲应该怎么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出的忠告就是：泰上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我个人体会，天意人事之间，还会有些差距：你要因之，得到个利导的结果就不错。你要利导之，结果就会是整齐了。你要整齐之，那结果就一定会是“与之争”。我们用事实检验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是先有了共产党主持各党派、各民族政治协商出一部《共同纲领》才做建国大典，开国四年后召开首届全国人大才制订《宪法》的。现在看，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对于多民族状况是“因之”而在《建国纲领》和《宪法》里都规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因此达成了全国各民族团结统一。但新中国成立后没几年，到了反右和大跃进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就不再甘于“因之”而是“利导之”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主导思想是“利导之”，但在行动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行动上，已是“整齐之”。这样在实践层面，即当时的百姓和现在的主流社会层面，都显示出“最下者与之争”的态势，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开会的那些因缘。

大家会有很多想法儿说法儿和办法儿，我主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面对现实讲“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有人特别愿意在这个时候讲历史规律和未来结局，但我相信一个连现实都不肯承认的人所讲的规律不会是客观存在，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形而上学。举例讲，如果说民族消亡是规律，

那我们请问谁先消亡？是大的主体民族还是小的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那不就是以强凌弱和以众暴寡？民无信不立！一旦立出这种法度，国家还能取信于民吗？我们因此还是得讲讲实事求是，讲天公地道和将心比心。先从认识中国开始：“什么是中国？”空间上，中国是一个复合体：她东南有港澳台，西北有蒙新藏；内有少数民族，外有海外华人。时间上：中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就是多元多样的语言和宗教。结构上，中国自己要发展，还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协调着发展。把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要讲的中国各民族家园的中国。接着说什么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

我主张把中国看成由太极图上的两仪构成的一个整体：一块是边疆高中国，一块是内地低中国。传统上，西部高处畜牧好动的边地是阳中国，东部低处农耕好静的内地是阴中国。我们说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阴阳互补的整体。两仪构成的整体就会有两条边界，一条是外部的国界，一条是内部的民族文化界限，具体讲就是中国的长城和长征路线。前现代化中国的外部边界模糊且有弹性，目前的国界都是近代 150 年才确定下来的。但中国内部的民族文化边界，或者说畜牧农耕边界，其存在时间就相当久远了。比如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示的汉代、隋唐的民族分布图就跟现在很相似了。她里面也有些变化，但变的只是民族名称，不变的是边疆与内地的结构。如果说这结构也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东三省的变化深些，其他基本没变。这给我们什么启示：两千年以来，大有为的王朝最长 400 多年，最短的元朝也有近百年。有为就会有“事功”，所有的事功都是想把内地边疆做成一样，即把各种各样的“民族”做没。结果怎样？这些王朝都没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仍然在那儿。联想的前苏联也要把少数民族和东正教都做没，结果这些都在而前苏联没了。这都是民族文化结构使然。

我们怎样看中华民族的结构？首先要看弄清什么是汉族，什么是少数民族。我觉得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是挺好的概括，只是他当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即 $1+55=56$ ， $56=1$ 的演算方式还是显得机械了。海洋今天理解：“多元”就是中国 56 个平等的民族，一体就是超越在 56 个平等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又可以用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角度来看她的多元一体性：中国首先有着多元的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这些小传统，第一是基层原生

的，就是她能做人口和文化再生产，能繁衍后代的传承文化；第二是复数多元的。在这些基层多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一个单数和次生的历史文化大传统，这个大传统不是属于某个民族，而是中国所有民族的一种上层建筑，中国每个民族都参与了她的创建和维系。从传统与现代性两元对立的视角看，多元侧重的是传统道德，一体侧重的是现代功利。套用到民族结构上，今天的汉族就是那些原先也各有小传统，但因为离国家政权中心近，所以其逐渐被大传统排挤和替代(displace and, replace)，因为把国家功利当成自身文化的人，说难听点儿就是为了追求现代功利而认贼作父数典忘祖的人，少数民族就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保持了自己文化小传统的人。今天看，现代功利和传统道德都是中国构建中华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形态不可缺少的资源，因而要讲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公平互惠、共同繁荣。历史上看，大小传统之间也是不断互动的。比如说周代，朝廷就有到民间采风的制度，“礼失求诸野”，同时也收集民间舆论以求改进体制。小传统也喜欢跟上层政治打交道，得些承认和荣誉，反过来可以维持地方的场面，甚至借用大传统来维系自身的传承。大小传统交换位置的事儿在中国也不少见。例如明代的满族(当时叫女真)就是一个地方民族，她的文化就是小传统之一。到了清朝，她加入并主导了中国大传统，满族官员多半是维护孔教的卫道之士。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族又成为少数民族，其文化又成了一种小传统。我想说中国有这么多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其实都是中国发展的战略资源。比如说今天中国做改革开放，要向中亚南亚发展，那维吾尔族、藏族的文化都是现在的资源。现在我们(如果)把自己的民族当成防范对象，把民族文化资源当成问题和负担，总想让她消亡，真消亡了又怎样？还不是要办学校重新学习这些语言才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因此我说这是汉人中心主义的表现。把这种想法当成国策和制定法律依据，就是罔顾国情和自乱法度，就会成为动乱根源。至于多元的民族需要怎样的一体法律，中国历史和现代西方国家都有不少资源可借鉴，关键是实事求是正心诚意地做，不要杂念太多吧。

最后讲少数民族在中国何以重要。第一是边疆领土和国家安全。中国领土有64%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中国的边疆从东北中朝边界算起，一路到东南的中越边界，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区。第二是自然和文化生态平衡。中国的生态复杂，不能用单一方式来开发利用，否则就会酿

成生态灾难，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保护当地生态的机制。你现在把少数民族跟他们的资源剥离开，让一帮生人伸手去开发，就一定会出生态问题。第三是道德和互信机制。少数民族是中国的道德底线。我们能承认、尊重和安顿好他们，说明中国还是中国。一旦让他们不安生，那中国就有问题了。谢谢！

任剑涛：张教授的发言使我们的这个题目引申到古今中外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话题。张教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从古今维度上讲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而且给我们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少数民族是我们重要的国家建设资源。我没记错的话，精华教授最近编了一套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书。我们不用多说，下面请出林精华教授。

林精华：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这个会很有意思，我们中国的学者，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匹夫有责，这个匹夫有责的身份可能和大众身份还不一样，这就是屈原、李白和杜甫、范仲淹……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和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文人，在自己职位上，利用自己的学识，在不同时期表达对中华民族问题的理解；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变了，专业化分工成为现实，一个学者很难跨越自己的领域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发言，况且六十年阅兵再次提醒国人，政府是能够掌控国家的，按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政府真的认真对待那些问题，肯定是能解决的，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现实性的问题没有障碍，即便有一些问题出现也是能够克服的。如此一来，我就以为，我们在此仅仅是以学者身份，对和专业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见解，而不是替政府出谋划策，根据我个人很有限的经验，政府里有的是专家，如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央部门工作，普遍受到很高的教育，去过一些国家地区，我们偶尔交流一些问题，他们站的高度虽然不是很高，至少想法很有操作性。所以作为有限的学者，希望不要改变讨论问题的角色。

现代国家应该坚持国家的强盛和独立，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就是站起来了；还有社会的发展，我们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确实证明了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个人在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时获得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包括两大方面，物质上的进步和个人诉求的重视、人权的尊重问题。而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处理好这些重大问题，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始终是围绕帝国来发展的！为什么一定是帝国问题，以及何谓帝国问题，它在俄罗斯来源和当代后果是什么，都

是很复杂的。按本人的亲自观察和感受、阅读俄文和英文，俄罗斯是帝国意识下重建国家和社会的：如怎样面对全球化挑战问题，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全球化的，他们有一个心理根据，就是认为俄罗斯是最强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又如人口问题，尤其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人不生小孩，结果俄罗斯人口每年以 200 万～300 万的速度递减，这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如何改变俄国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和能力，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改变，因为俄罗斯人的脑子里面维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但现在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是跟这个对不上号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叶利钦尝试要大家提供一个统一的思想，如果真需要的话，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谁能提出一个“国家思想”，就能给人很多钱。至于少数族裔和俄罗斯主体族裔之关系怎么重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至于重建一个符合国家现代秩序和规范的问题，比如说关于选举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好像很符合现代国家的这种架构，但在俄罗斯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过去有一套基层的党组织操纵的程序，有问题会控制你。我在俄罗斯生活过两次，第一次一年，第二次半年，两次都差不多碰到了选举问题，第一次不太清楚，那时很兴奋，第二次就比较谨慎地问他们。对于选举问题，他们也不敢大声宣讲，支持谁不支持谁，搞不好身家性命都不保，我一点都不夸张地讲。可见，俄罗斯现实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国家建构问题，这正是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英国著名学者叫托尔兹(Vera Tolz)所认为的最大问题就是认同问题，即怎么重建俄罗斯认同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认同问题成为第一大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他的观察还是非常细致的，有见解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帝国建构的这种形式，由于俄国是多族裔构成的帝国，俄罗斯族裔的身份认同实际上也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的，他认为是政府和警察的发展超越或替代了一切，在 1990 年以后没有完成，所以这是个很可笑的事儿，不符合宪法的原则，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和民族的认同过程中，是不是一致的，因为如此，所以也出现了 1994 年以来车臣的战争，这是我们知道一个车臣战争的原因，俄国在这期间不光有车臣问题，很多少数民族族裔如高加索人相关的地区都有这么一个情况，除了车臣以外，还有伏尔加河地区，穆斯林很盛行的地区，这个地区的自治程度非常高，普京 2000 年搞“中央区”，七大行政区的时候，就派总统代表去监管，伏尔加河地区总统代表为盖

达尔，他曾召集大家开会，有一个州长带着一个尿壶上场，盖达尔很生气询问，被告知“我们没钱，改造厕所行吗？谁能给我们州解决上厕所的问题？”重建俄罗斯“认同”是当代趋势，虽然俄语中没这个词、2000年开始音译，这意味着俄罗斯开始改变此前不重视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也说明现在俄罗斯的一切问题未必是苏联解体造成的，而是历史的结果，1905年俄国革命已经蕴涵着少数民族如犹太人和非俄罗斯人联合反对沙皇了。也就是说，族裔问题在俄罗斯和苏联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强制性解决，阶段性有效，但最终是导致问题更为复杂，苏联解体完全不是一批政治精英的权力争斗，更有各加盟共和国各自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诉求之和的强大能量推动的结果。因而，今天俄罗斯政府改变为用经济手段去解决不同族裔共同认同俄罗斯国家。

任剑涛：精华说的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讲，1949年以后我们是以俄为师，1990年以后，我们是以俄为鉴。下面我们要请出来的是翁贺凯老师。

翁贺凯：我接到陈明兄的E-mail，说要开这么一个会议。我昨天还发短信问他要不要准备，他说不要准备，我又是被安排在下午，我就想着先听听各位老师各位先进的讲话，再随便讲讲，所以真的没准备，而且我以为每人的规定发言就十分钟，应该是讨论的时间比较多，没想到主持人分配到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二十分钟，所以很难办，我真是只能随便先说一点。刚才强老师又说要从历史开始讲，让我们搞历史的先给大家做做背景材料的介绍，我想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个，就是把我最最近这几年看到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历史，我感觉比较能触动到我、刺激到我的，或者说我原来认识不足注意不足的东西，介绍给各位老师，作为一个背景材料供大家继续讨论，我自己的看法比较少。

我想我还是从民族主义这个问题谈起，因为民族也好，国家也好，民族国家也好，他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我比较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香港科大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我做的是张君勱的思想研究，我把它放到“自由民族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它、观照它。三年多前我参加社科院近史所的一次研讨会，修改、提交了一篇论文——《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西方学理”和“中国问题”》（后来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部文集里），对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历史做了一个清理，之后就没有再碰这个问题。这个学期，